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 逄锦聚

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方面面,理论方面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包括经济理论界学者们的智慧,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论,并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创立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妥善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理论;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等等。这些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宝贵财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论则具有长期的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实践中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立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开创并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凸显的外部环境,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的实践中,创新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目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是集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的理论;坚持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坚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坚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坚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取得了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蕴含着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财富,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学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打破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神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不仅可以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可以创立立足中国实践又反映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学。

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

改革开放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例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方向;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等等。其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是重要的经验之一。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推动理论发展,是检验理论的标准;科学的理论又可以为实践开辟道路,指导实践沿着符合规律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是这样相互作用,推动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并取得成功的。1978年始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改革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后企业改革的展开,价格改革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的跟进,直到今天改革的全面深化,40年来,实践每前进一步都对理论创新提出了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适应实践要求的进程中从无到有,从不成熟不完善到比较成熟和完善。而一旦形成了科学的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便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传统体制的弊端和羁绊,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长足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新体制得以建立并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和基础。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改革开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秘诀。

但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不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而是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们确实引进、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微观运行、宏观运行以及经济增长的理论,但我们对这些理论的基本态度是只能借鉴、决不照搬。西方经济学包含着有益的成分,也包含着不科学的成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时间复苏乏力,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质疑和颠覆。即使对西方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由于国情不同,在用到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时也未必有用。所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我国,只能是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实践中的应用也基本都局限于具体的实务的层面。就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而言,真正指导我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根本理论、主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经济理论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例如,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本不存在,又谈何指导?又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比比皆是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只能借鉴来揭示市场经济一般性的内容,但要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作为指导的理论就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也无止境。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未来长期的任务。

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在新时代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开放性上下功夫。科学性,就是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其中包含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上下功夫,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系统经济学说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人民性,就是要坚持一切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实践性,就是要以时代发展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在实践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上升为系统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撑。发展性,就是不教条,不僵化,不封闭,不保守,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经济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开放性,就是要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反映和平发展的时代要求,广泛吸收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有益成果,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发展特殊规律的同时,揭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开放性,既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向,也是检验一种经济学理论是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标准,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长期坚持并努力实现。

(作者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讲席教授)

质量

□ 刘伟丽

质量文化是指一个关注质量的组织所倡导的、通过满足顾客和其他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来实现其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在该组织的习惯、信仰、理念以及被观察到的行为和态度当中,是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产生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质量文化。

质量文化在企业中发挥着凝聚、辐射、激励、规范等作用,通过质量文化建设,可以使员工接受并认同组织的质量愿景、质量使命、质量价值观和质量目标,增加员工对组织的质量要求的认同感和依存感,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质量意识和质量氛围。好的质量文化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创造力、效率和忠诚度。要培养出好的质量文化,企业质量文化建设就必须包括对社会有益的质量目标、全员认同的协商和决策模式、始终如一的归属感、全员自我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管理者或者资深员工的模范带头作用等具体目标。拥有不同质量文化的组织,员工对于质量管理的重视和理解会有很大差别,一个具有优秀质量文化的组织,建立并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会更加容易,取得的效果会更好。因此质量管理体系在一个组织得到成功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必须要求组织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在员工中形成优秀的质量文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企业的质量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着重于对所在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制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具体而言包括质量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合理的质量计划、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可行的质量管理工具方法、对质量管理结果的统计分析,等等;还包括对组织人员的要求,对相关人员的能力培训,以及组织所有人员建立关于质量和质量管理的理念与价值观、习惯与行为模式。

培养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的质量文化,对组织或企业的人员有以下要求:一是能力的要求,包括对体系和计划的理解,对方法和工具掌握的熟练程度等,组织中的每一名人员都要充分理解质量管理体系的内容及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并熟练掌握相应的质量管理工具、方法;二是态度的要求,即每一名参与者都要重视、尊重并乐于接受质量管理体系的各项制度、规范及要求,每一名参与者都愿意并积极努力在自己的认知和能力范围内,尽最大能力做好本岗位的工作,尽最大努力履行好本岗位的职责。

近年来我国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在建立良好的质量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比如,航天航空企业的质量文化坚持"质量是政治、质量是生命、质量是效益"的质量理念,坚持"严慎细实"的质量行为准则,在精神层面、行为层面和物质层面构建航天质量文化体系,打造了世界级的航天产品;许多制造业企业的质量文化体现在零缺陷、精益求精和执着进取,保证产品质量,保持质量持续提升和改善。许多城市的质量文化体现在其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坚持"质量成就未来"的质量理念,通过城市质量文化建设,提升城市全民的质量素质。

当前我国建设质量强国,学术界应该将中国优秀组织的质量文化进行研究和整合,不断提升我国质量文化的自信力,并建立中国特色的质量文化。首先,政府应通过中国质量奖和各级政府奖,激励各种组织和企业积极培育质量文化,重视将质量作为战略融入企业和组织的经营管理过程,鼓励企业和组织积极开展质量文化的各种活动。

使质量文化建设成为组织和企业的自觉行为。其次,要让组织和企业认识到建立合理的质量文化制度的重要性,并鼓励组织和企业建立常规化的制度,在具体实施中,应制定和执行质量文化行为手册与准则,让组织和企业的质量文化不仅深入每个人的心中,还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最后,通过弘扬优秀的组织和企业的质量文化,引领和提升全国各类组织与企业的质量文化素质,带动全国不同领域的组织和企业都重视质量文化建设。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发展金融科技 促进普惠金融

□ 牛仁亮 倪晓明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日益成为热点,并进一步催生了金融科技这一新概念。金融科技可以简单理解为金融+科技,但又不是两者的简单组合,是指通过利用各类科技手段创新传统金融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提升效率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由于金融科技降低了普惠金融的交易费用,因此具有服务于普惠金融业务并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势。

交易费用是约束人们选择行为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经济学界将交易费用定义为使用市场的费用,主要包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搜集的搜集费用、取得交易对象信息及与其进行信息交换的信息费用,还有议价费用、交易监管费用等等。近年来,学术界将交易费用概念进一步拓展,演变为合约安排所需要的费用,这对理解和分析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商业银行的产品及服务可以视为与客户建立的不同服务合约关系。金融科技领域一直强调的普惠金融获客成本降低实际上是一种新型客户服务合约取代交易费用更高的传统服务合约的过程。在互联网未诞生之前,商业银行对客户的服务局限于物理网点,受制于成本收益约束,其物理网点往往布局于繁华地段。偏远地区的普惠金融客户要获得商业银行的服务,需要花费较高的交通费用、等待时间等额外交易费用,因此他们很少或不选择去银行办理业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商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各种基于金融科技的服务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极大降低了普惠金融客户的额外交易费用和银行自身的服务成本。一方面,普惠金融客户能够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兴起降低了商业银行挖掘普惠金融客户价值链的交易费用,使其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从而降低了客户甄选产品信息的交易费用。总之,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是朝着建立更低交易费用的服务合约方向发展的。

经济学和金融学通常将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于事物认知的不完备,例如:股票投资,限制股票涨跌的因素很多,人们不可能对所有限制因素进行信息的获取和认知,所以就存在风险,这也意味着有较高的获取信息费用。信息费用的高低也约束着人们的选择行为。人们之所以愿意将资金存入商业银行由其进行信贷投放,而不是直接寻找投资对象,是因为识别优质客户的信息费用很高,存在较大投资风险。商业银行因拥有成熟的风险评级方法来对客户进行信息甄别,信息费用相比普通人要更低,因此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存贷利差来赚取收益。但这种模式主要基于透明的财务数据分析和充足的抵押品担保,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客户缺乏透明的财务数据及有效的担保物,对商业银行而言就意味着信息获取成本高,这是导致这些普惠金融客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主要原因。金融科技的发展为识别优质普惠金融客户、降低信息费用带来了可能。一是商业银行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财务数据,可以扩展与客户相关的数据,比如有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其企业主具有良好的声誉、重要的知识产权,对这类信息进行量化处理后,可以帮助银行进行信用甄选。二是商业银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模拟金融活动、预测风险、找准客户需求,能够切实提升其服务普惠金融客户群体的效率和能力。

当前,我国扶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分析目前的致贫原因,除去完全丧失劳动力的贫困户需要政策保障兜底外,其余大部分贫困户是因为外部原因(例如:患病、受灾、子女上学、缺乏项目启动资金等)引起的暂时性贫困,这类贫困户可以通过外部资金"输血式"(例如:产业扶持资金、小额信贷、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等)引导激发自身"造血式"发展来摆脱贫困。单靠政府财政支持难以快速满足大量贫困户的资金需求,因此,需要金融机构与政府协同配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扶贫效果。但由于缺乏有效担保抵押品,基础信用信息不完善、贷后风险管理成本高等原因,贫困地区农户及小微农业企业较难从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融资服务。金融科技的应用与普及,恰好能够解决普惠金融服务在向贫困农户和小微农业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时的成本与信用甄选问题,从而成为解决其"融资难"和"融资贵"困境的重要途径。

借鉴金融科技在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可以探索建立一种小微金融机构与大型商业银行合作为农户及小微农业企业这些普惠金融客户提供融资服务的模式。即,由小微金融机构利用在获取客户软信息方面的优势对普惠金融客户进行初步筛选,筛选出一份高质量客户名单提供给大型商业银行,再由大型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投放。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利用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来盘活存量信贷资产,进一步拓展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尽管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创新产品可以解决贫困户、小微农业企业融资难问题,但是美国次贷危机血的教训仍历历在目。因此,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更为重要的金融创新监管和风险防范措施。利用其降低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方面的优势,金融科技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管理过程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一是可以对基础资产池做现金流分析。资产证券化的机理是大数定律,尤其针对中小企业贷款、小微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等入池基础资产,只有数量足够多且相对独立时,资产证券化才有助于分散单项资产的违约风险,提高产品的信用度。另外,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在于现金流的分析,如果不能对资产池中的现金流进行有效准确的分析监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和后续管理就会产生风险。由于笔数多、资产分散度高、其工作量巨大,基于多笔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分析技术就构成了大数据技术在资产证券化领域的应用基础,通过构建科学的现金流分析模型,运用先进的数据挖掘算法,进行精准的现金流预测,可以确保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正常发行和兑付。二是有助于资产证券化产品信息披露的透明化。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披露制度非常重要,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起者及管理者必须要做好对入池资产的信息披露工作,加强对中小企业贷款尤其多家中小金融机构组成的中小企业贷款池信息的风险披露管理。金融科技领域的区块链技术具备公开、透明的特点,可以解决资产证券化整个过程中多主体引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区块链中存储的信贷资产质量状况的变化可以实时反馈给所有相关参与方,并且由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可以保证所有信息的真实性。通过产品发布、交易、托管、流通到监督的全流程区块链化,最终实现资产现金流信息的可追溯。三是通过金融科技领域采用的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识别并追踪违约客户,提高客户的违约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用违约风险。

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金融机构作为服务普惠金融客户群体的主力军,必须在金融科技创新这篇文章上下足功夫。要在构建新机制、完善新政策、搭建新平台的基础上,立足降低风险、提高效率的原则,以资产证券化为基本抓手,以金融科技创新推进产品创新,使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子越来越宽广。

(作者分别系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科技与产品管理局高级专员)

论点摘编

农村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有五大事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分别是土地制度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实施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土地制度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了农产品供给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为中国在40年里利用人口红利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以市场化为目标的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为国民经济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农村税费改革催生了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施精准扶贫脱贫,为建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新格局积累了条件。今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农"问题仍不可忽视,必须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马晓河等人撰文

国际贸易冲击与产业结构变迁

通过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冲击对经济体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在开放经济中,由技术引起的外贸价格冲击导致了经济的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显著分化,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政府应致力于鼓励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实现产品劳动成本优势向产品科技含量优势的转变,全面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二是由于消费者偏好调整抵消了部分外贸价格冲击,使得经济消费结构比产出结构具有更好的风险抵抗力,因此,应合理优化内外需结构,加大内需对经济的带动力,充分发挥消费者偏好对经济结构冲击的熨平效应,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评论》(双月刊)2018年第4期,张建华等人撰文

经濟學

理论部主办

邮箱:gmjjx@sina.com 电话:67078948